

第五屆“21世紀的公共管理：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林瑞光*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公職局、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第五屆“21世紀的公共管理：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2年10月12日至10月13日在澳門成功舉行。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從2004年舉辦至今，已走過了8個年頭。本次會議的主旨是：回應全球公共管理重大問題，開展及時的、高品質的對話；加強國內外學術界交流與合作，推動公共管理研究發展；提升澳門研究，讓更多公共管理實踐者、研究者瞭解澳門、研究澳門。來自內地、香港、臺灣以及美國、英國、澳洲、法國、義大利、瑞士、以色列、俄羅斯、日本、韓國、印度、新加坡、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共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以及近二十位澳門學者及公務人員參與了是次會議。

在開幕典禮上，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公職局朱偉幹局長致辭，他指出跨入廿一世紀，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及科技的不斷發展，為當今世界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也為世界各國及地區的合作提供了新機遇。經濟全球化將社會帶入一個快速變化的新時代。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政府職能不僅需要轉變，更重要的是必須創新和開發新的行政管理理念及方式，以鞏固和完善現行公共行政體系和配合社會發展的步伐。他希望透過定期在澳門舉辦大型國際性研討會，匯聚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在公共行政上的研究成果，透過瞭解世界各地公共行政的發展及現況，有助於特區政府拓展新視野及探索新思路，繼續深化科學施政，加強政策調研，努力構建制度化、透明化的行政環境，不斷提升政府的管治水平。隨後，大會邀請了來自北京大學的周志忍教授、美國行政學會的劉國才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Andrew Podger教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的詹中原教授、香港城市

* 中山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大學的陳漢宣教授，以及澳門大學的劉伯龍教授分別作主題發言，他們分別就“中國政府跨部門協同機制”、“經濟危機與公共管理的挑戰”、“社會安全福利醫療體系”，以及“臺灣公共行政學科典範變遷”、“中國地方政府績效管理中的共性目標”、以及“澳門的食品安全體系對中國內地的啟發作用”等問題和領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見解。周志忍教授圍繞中國政府跨部門協同機制，探討了協同組織的模式、特徵、效果及評價，並從技術理性及制度層面進行分析。劉國材教授指出經濟危機與挑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回顧過去的政策和理論、發展公共管理體系新理論的良好機會。公共管理在重建公眾信任，減少政治極化，利用有效資源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和支援政府的正當角色方面起著重要作用。Andrew Podger教授認為社會保障和醫保體系是一個龐大的運作系統，在發達國家中佔用大量的財政預算，在發展中國家的財政預算比例也在逐漸上升。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和醫保體系的模式受數十年前的政策影響而定型，與之對比，發展中國家則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形成。詹中原教授從學位論文、期刊、書籍以及大學設置的課程四個數據來源分析臺灣2000年以來的公共行政學科典範的變遷，並得出10個有關變遷路向的結論。陳漢宣教授指出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系統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對共性目標的強調，共性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者為滿足有效治理地方事務的政治需求和社會發展而採取的策略。劉伯龍教授認為內地政府可以從澳門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中得到一些啟發，食品安全管理需要各個有關部門的充分合作和協調。

本次大會延續上一屆會議的傳統繼續開設“澳門論壇”。參與這次“澳門論壇”的嘉賓有中山大學的陳瑞蓮教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丁力教授、中山大學的陳廣漢教授，以及來自澳門大學的郝雨凡教授和吳德榮教授，論壇由劉伯龍教授主持，他們就“區域合作與澳門發展”這一主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展開了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陳廣漢教授認為澳門的經濟發展有可喜的方面又有可憂的方面，並指出澳門有必要實行產業適度多元，但同時指出澳門缺乏企業家精神，並最終樂觀地認為澳門有資本有品牌去參與區域合作。陳瑞蓮教授則呼籲澳門特區政府要充分認識到澳門區域合作的機遇和緊迫性；以及要對

廣州南沙新區的設立和發展作出回應；並希望特區政府努力打造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貿服務平臺，以此帶來物流、會展等行業的發展。她認為，澳門在區域合作方面，總體來說是“雷聲大，雨點小”，為改變這種局面有必要做到：1.政府重視區域合作；2.成立專職機構；3.制定有效的利益機制；4.設立區域合作的專項基金；5.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6.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丁力教授同樣認為，澳門在珠澳合作方面沒有動真格，其中的心理障礙大於現實障礙。他認為合作的前提是合作雙方要有抱負，指出澳門不能靠博彩業基業長青，並建議澳門要有大的眼光，通過大陸的“放大器”作用發展經濟。吳德榮教授針對上述的觀點指出，澳門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區域合作的動力不大；澳門的博彩業一枝獨秀正是區域分工合作的結果，多元化和區域合作表現出矛盾的一面。郝雨凡教授則認為澳門沒有發展適度多元的動力，也沒必要發展適度多元，澳門只要做好自己應該做的就行了，但他同樣指出澳門要有危機意識。另外郝教授認為區域整合是澳門最大經濟發展最大意義的部分，橫琴合作開發是加深區域整合的一種嘗試。

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已進入了一個新的大變局時代，傳統公共管理問題不僅存在，還可能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新的問題也會隨之社會的變遷不斷出現，各國面臨公共管理問題更加嚴重且極具挑戰。公共管理者必須深刻認識到這種變化和做好準備應對挑戰。因此，本次會議將主題確定為“大變局下的公共治理”。研討會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包括全球社會公平挑戰、公共財政與治理、公共部門改革與創新、地方治理改革與發展、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公共管理、社會管理與創新、社會變遷與政策創新、全球福利體系反思、審計與政府債務、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廉政與透明政府、新媒體時代的公共管理、社會抗爭與社會治理及公共管理新議題等共二十一場的分組討論。

一、全球社會公平挑戰與社會抗爭

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價值觀的共同指向，也是不斷追求的目標所在，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既是公共管理實踐者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也是公共行政研究者的方向所在。當今世界社會不公問題此起彼伏，社會抗爭現象更是風起雲湧。對此與會學者展開討論。

一是社會公平問題。來自吉林大學的周光輝教授和殷冬水副教授認為中國的社會不公問題，主要是由政治領域利益表達不平衡造成的，因此中國要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一方面要提升社會弱勢群體的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則要提高國家自主性，弱化強勢群體的政治影響力。而澳門科技大學黃湛利則圍繞工人組織工會權、集體談判權及罷工權所謂的勞工三權，對香港政府勞資關係進行闡述和分析。他不同意香港公務員工會在勞資關係上的處理方法，建議香港政府須妥善處理公務員勞資關係，顯出有效的管治能力。

二是社會抗爭問題。吉林大學副教授王郅強認為關注和研究個體或少數群體在社會轉型期中特定行為是研究中國社會矛盾最直接的切入點，對於認識和分析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是必要和有意義的。他以身體抗爭作為利益矛盾的分析視角，認為身體抗爭是公民在利益博弈過程中所形成的將自身利益訴求納入公共政策議程的一種途徑和方式。並指出用制度維權代替身體抗爭才是走出目前利益矛盾中公民維權困境的未來方向。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陳慧榮博士則從中國信訪的角度講述社會管理問題，他以上海市信訪工作為例子，通過剖析信訪體系的內部運作及其對不同類別上訪人的處理方式，解釋政府低質量接訪如何促使訪民採取非正常上訪。他發現信訪系統對初訪、重複訪和非正常上訪處理方式和投入的精力都很不同，由此引起了上訪者不斷升級自己的行動策略。除此之外，中山大學張書維博士認為近年來在我國呈迅速上升之勢的群體性事件是一種典型的集群行為，群際威脅是群體性事件爆發的重要情境因素，但尚缺乏有力論證。他的目的是建立群際威脅對集群行為影響的整合模型，一是為了揭示群體性事件的社會心理制，二是在實踐中更加準確地預測和化解群體性事件，為政府部門的公共管理提供策略支持。

二、公共財政與治理

公共財政是政府運行的命脈，它影響深廣，不僅影響到公務員的微觀行為，也能影響到政府的宏觀決策。這次會議，給予了公共財政及其治理必要的關注。

上海財經大學徐曙娜、任超然、張遠通過對中國28個省的面板數據分析，分別探討了地方財政支出各個專案對城市化進程的影響，認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有著其自身的特點，並且與財政政策的側重面緊密相關。他們研究發現對城市化有增進效用的為科學事業、教育事業、基礎建設和醫療衛生支出。然而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起步較晚，社保基金管理有待加強，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對於我國城市化進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作用。

澳門財政局鄧達榮則從財政的視角分析特區政府採購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他指出政府採購是與公共政策和社會變遷的表現息息相關，善用財政資源及有效執行財政政策，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工具，亦有催化相關行業發展的作用。另外他同樣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採購項目的開展符合地區的整體和政策性規劃，直接促進和推動地區經濟和行業發展。

另外，來自義大利錫耶納大學的Riccardo Mussari教授帶來義大利的案例講述財政聯邦制和會計協調的一致性問題。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的Weerasak Krueathep博士則著重分析泰國公共財政背景下的財政幻覺以及財政幻覺對選民預算偏好的影響。

三、公共部門改革與創新

公共部門的產生的發展深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環境的影響，其存續與否、改革與調整應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納入考慮的範圍。另外公共部門是公共服務的主要供給者，僵化的公共部門不利於供給效率和品質的改善和提升，因此公共部門的改革和創新是常青的話題。與會學者紛紛表達觀點。

復旦大學竺乾威教授以國有文藝院團轉企改制為例，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對中國的文化體制改革進行分析。他認為國有文藝院團的轉企改制屬於一種自上而下強制性制度變遷，這一變遷方式可以降低改革成本，但會帶來共識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改革的抵制。轉企改制的成功取決於政府與被改對象的報酬互相增長。

西安交通大學毛瑛教授等人則從陝西省縣級公立醫院改革的實踐來研究公立醫院治理機制。她認為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是完善公立醫院治理機制，完善的公立醫院治理機制有助於理順政府與公立醫院的關係，能從治理的角度解決醫院發展的動力問題。她研究發現完善政府財政補償機制和健全人事分配制度，可以有效地推進公立醫院改革進程，凸顯公立醫院的公益性。

四、地方治理改革與發展

地方治理以其特有的複雜性挑戰著公共管理者的治理智慧。其治理範圍之廣、問題之複雜、治理結構的多層次等為公共行政研究者帶來了研究上的困難，但側面上說明了研究地方治理大有可為。對此，與會學者帶來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一是中國“擴權強縣”改革效果的比較研究。中央財經大學樊勇和王蔚通過運用差分內差分方法和固定效應模型，以浙江省縣政擴權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實證對比分析了“擴權強縣”改革對擴權和未擴權以及擴權內部強、弱縣之間的縣域經濟和財政收入的不同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第一，改革有力地促進了擴權縣的縣域經濟和財政收入；第二，改革對強縣的促進作用比弱縣更為顯著；第三，強縣發展在較大程度上依賴固定資產投資；第四，地方財政支出和二、三產則更有助於弱縣的發展。並對各省下一階段推行“擴權強縣”改革的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省市政府應實現從“強縣擴權”到“擴權強縣”的跨越；強縣政府應擺脫對“投資型”增長方式的過度依賴；弱縣政府則應優化公共支出結構，努力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二是地方法團主義與地方政府角色的關係研究。香港教育學院吳木鑾博士指出地方國家法團主義是西方學術界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和公共財政成功的重要理論之一。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中央和地方關係產生深刻的變化，官僚體系內部也有諸多的改革和變化，地方國家法團主義是否仍然適用便成為一個問題。吳博士認為要理解當下的中國，地方法團主義需要進行實質性的修正。他在提出“後地

方國家法團主義”後，分析地方政府的角色，認為地方政府的角色已從發展型轉向庇護型。

三是澳門的社會服務研究。澳門理工學院姚瀛志從澳門的實際出發，分析澳門社會人口結構與樓宇老化問題，並對現有的社區服務提出服務策略的建議。他認為要制定社區服務未來發展策略，需以社區問題、區域變化、專業質素等方向作主要考慮。

五、社會管理與創新

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社會管理問題日益凸顯出來，其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也交叉其中。如何應對挑戰，如何更好地抓住機遇，便是擺在社會管理者的面前的現實問題。重新審視管理方式，改革管理行為，尋找價值基礎或許是解題的要素。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對此問題又是怎麼看的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彭向剛及吉林大學博士研究生程波輝以績效評估為切入點，認為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明顯出現動力不足、停滯不前甚至反彈的態勢，陷入建設困境原因之一是政府績效評估的杠杆性功能沒有發揮到位。為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重構政府績效評估的指導思想體系、制度體系、組織體系、指標體系、方法體系、結果運用體系，充分發揮績效評估體系對促進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杠杆作用。

來自澳門理工學院黃兆輝和羅筱慧在回顧了最新的關於後現代主義的爭論後，應用魅力型權威和結構主義的理論工具，重新審視了戰後澳門和香港的歷史，發現二戰以來，這兩個社會面臨著一些大的變化，他們必須在很短時間內作出選擇，而這些選擇的正確與否取決於社會模式能否熟練地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取得平衡。

而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徐曉林和武漢大學朱國偉博士認為新的社會秩序的尋求需要一種新的理性作為道德基礎，新生活秩序的公共利益指向對承擔著價值宣導的全國性治理機構中央政府而言有著特殊的要求。中央政府作為一個道德實體，不僅需要它具有道德自主

性，更需要它在職能安排與履行中，以公共利益為價值指向，體現出基於自身“強公共性”特徵的道德自覺。以“道德英雄”的身份承擔社會價值引導的責任。

六、社會變遷與政策創新

政策是政府管理、落實施政意圖的工具。政策的制定、施行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其實行效果也因時因地而異。對政策實施效果的研究有助於改善政策的效力，為制定更好的政策做鋪墊；對其他國家政策移植問題的研究則能更好的拓展本國政策制定者的思路。這次會議，與會學者又對哪些政策進行了審視和研究呢？

一是中國的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及其優化問題。2004年，我國開始大規模實行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最終形成了以糧食直接補貼、農資綜合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以及最低收購價政策為主要內容的糧食補貼政策體系。但是這些政策效果如何呢？有沒有實現政府既定的政策目標呢？帶著這兩個問題，上海財經大學陶勇通過對全國31省、476縣（市、區、旗）、671行政村、6742農戶、465種糧大戶的調查發現中國的糧食補貼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糧食直接補貼獲得率較高；農戶對糧食補貼政策滿意度較高，絕大多數農戶從中獲益。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糧食補貼標準較低；農戶對糧食補貼政策認知度較低；糧食補貼方式不合理，一部分實際種糧農戶不能享受相應的補貼；糧食補貼政策對促進農業生產的作用不大；糧食補貼政策不能切實保障種糧大戶的利益，不能有效保障糧食生產的規模化經營，等等。為此，他建議加大農業補貼政策宣傳和監管的力度；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加大補貼力度，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改進糧食補貼方式，讓種糧農民受益。

二是政策轉移與政策組裝問題。來自中山大學的蔣絢博士認為雖然在各個地方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歷史條件不同，但創意產業作為一種政策概念已在全球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種傳播途徑以政策轉移的形式出現，並分為兩個不同階段：一是世界範圍的解構情景化和地區間的通過組裝重構情景化。第一過程要歸功於技術層面和

中立的創新產業觀念，但裝配的過程需要考慮當地環境。她以中國創意產業政策為例子進行了說明。

七、全球福利體系反思

北京大學劉繼同指出2009年爆發世界金融危機和正在蔓延的美債、歐債主權危機的重要社會後果是，引發西方“福利國家”和世界各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危機。如何科學認識、反思評估和改革發展社會福利制度，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政府規管與社會治理等關係，成為世界各國公共政策與社會政策議程的優先議題。他根據世界各國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經驗，首次建構現代社會福祉與社會福利概念框架，界定公共服務、社會服務、個人服務、社會保險、社會救助服務和慈善公益服務的相互關係。並首次提出以公共服務、社會服務和應急、社會救助服務為主體的中國版社會福利制度框架，實質是界定政府職能範圍，確定社會服務優先領域，描繪中國社會建設“時間表和路線圖”。

來自東北大學的王穎副教授則從新自由家長主義治理的視角分析美國福利政策改革和貧困治理範式構建。她認為美國社會福利改革的發展和轉型深受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影響，在新的社會福利改革中，新自由主義和新的家長主義決定著社會福利改革的方向，貧困治理紀律處分制度是在社會福利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最後，她認為美國的社會福利改革是在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家長主義下，客戶端的工作和個人責任的努力取得成功。但是卻隱藏著一個問題，就是它使得大量的福利收入仍處於貧困的人進入低收入的勞動力市場，因此有必要將這個由新自由主義的家長主義定義的邏輯打亂。

八、審計與政府債務

2009年底，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國，由於居高不下的預算赤字，以及整體經濟結構的脆弱，先後開始出現主權債務問題。最後演變成影響全世界經濟成長與金融

穩定的“歐債危機”。從這場危機中，政府或公共行政的實踐者和研究者能否得到一些啟示呢？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徐仁輝認為“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應重新檢討政府的角色功能；總體經濟成長可確保財政的穩健；財政與貨幣政策必須兼顧；債務管理須更完善。並最後提出健全債務管理措施做法：一是控制債務成長；二是債息負擔最小化；三是維持國家債信；四是平衡代際負擔。而針對澳門方面，來自澳門經濟學會的胡家銘則建議澳門特區政府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應採取兩方面的措施：一是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包括加大公共工程建設投入、提高居民福利和信用擔保等手段來穩定經濟；二是通過與中央和周邊地區緊密聯係，合作應對金融危機的衝擊，防止出現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大面積倒閉。具體來說有：發展澳門實體經濟，不斷加強對旅遊博彩業的服務水準；加強對博彩企業資金鏈條的監控；做好財政儲備的投資保值工作；加強金融監管；加強與鄰近區域合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衝擊；進一步促進澳門消費市場，建立穩定的內部市場；構建“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加大對中低層居民補貼；完善投資環境，保持對外資的吸引力；優化勞動力結構，提升經濟長遠的發展動力，等等。

九、廉政和腐敗控制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腐敗問題一直以來是公共管理領域比較棘手的問題之一，但卻阻擋不了各地執政者和社會治理腐敗的決心。在研究領域上，各個學者也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或者從自己所處的環境出發，或介紹本國的反腐敗運動，或探究腐敗產生的根源，又或發表自己對治腐的看法，等等。這次會議有幸彙聚了各個專家學者的智慧。

一是國外的經驗和研究。來自印度德里大學的Sreemati Chakrabarti教授首先介紹了發生在2011年印度民間社會團體發起的反腐敗運動。他討論和分析了這個運動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如何影響到國家層面，反過來又如何迫使國家作出回應。最後他評估了當下印度國家與社會團體的關係。韓國崇實大學的Young Jong Kim教授帶來了

韓國的反腐敗案例。Young Jong Kim教授指出普遍的腐敗已經限制了韓國的發展，韓國政府雖然一直致力於腐敗治理，但收效甚微。他認為腐敗文化是韓國社會中的腐敗現象最重要原因。因此韓國的反腐敗戰略的模式轉變更應注重治理腐敗文化，建立一個著眼於道德和文化的反腐敗體系。來自越南的Nguyen Trung Tiep博士則認為腐敗的內在原因是非透明的公共權力和公共權力的非理性。他表示，反腐敗的政治決心是堅定的承諾；有效的政治制度是反腐敗最好的方法；支持媒體在反腐敗方面的監督；強調公務員的公共服務道德；改革公務員的薪酬及考核制度；增強社會的反腐敗意識。南洋理工大學的于文軒博士介紹了新加坡的反腐敗政策。他認為新加坡反腐敗模式的成功不在於它的獨特性，而是契合了代理理論、集體行動理論提出的反腐敗的一般原則，同時，他也提出新加坡在具體的制度設計和政策中所採取的措施有一定的新加坡特色。另外他也對這種模式表示擔憂，因為不斷變化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顯著地挑戰這種模式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二是中國學者的思考與發現。香港城市大學的公婷教授以財產公示制度作為切入點，揭示中國廉政建設轉型的特徵與機制。認為中國政府的反腐戰略已經從運動反腐向制度反腐轉變，並對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意義進行了討論，最後她認為這種轉變意味著中國政府對腐敗的認識以及反腐的模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她的同事李莉則認為作為新媒體的微博已經深深影響了對腐敗現象的治理。她通過對廣州公車管理制度改革的研究發現，微博已經成為公民與政府之間溝通的傳統方式，它賦予了公民監督和質疑政府的權力，反腐敗的模式從“自上而下”的模式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模式，這種模式的轉變擴大了公民的監督權。

十、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

公共行政人員是公共管理的主體，他們的思想、行為模式深刻地影響到公共行政的效率，對其研究有助於幫助公共管理者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施政觀念。對此，與會學者發表自己的看法。

海南大學安應民教授非常看重公務員的行政能力，認為公務員的行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府的管理水準和工作效率，影響著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因此必須加強公務員的行政能力的培育，在充分瞭解行政環境、行政職能、行政體制、行政機制、行政結構和行政關係對行政能力影響的基礎上加強以提高公務員行政素質為核心的培訓體系建設，創新培訓機制和培育方式。

天津社會科學院田華博士則對公務員的決策行為興趣頗濃，他認為文化因素是影響決策行為的重要因素。指出有意識地利用文化去幫助公務員建立起優秀的決策理念及思維模式，並使其在決策時無意識或下意識的做出優質決策行為至關重要。他以天津和澳門的公務員作為研究對象，同樣印證了文化是產生兩地公務員決策行為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

十一、新媒體時代的公共管理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諸如微博、數字報紙等新媒體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它們是否改變了當下社會的傳播格局，是否影響了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來迎接新媒體帶來的挑戰。對此，與會學者展開討論。

澳門特別行政區治安警察局劉國熙副警司認識到傳統媒體的網上版本使用率以及手機應用媒體程式的興起，對澳門居民的媒體使用習慣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他通過分析美國及中國等地政府利用新媒體進行的公共管理情況後，建議澳門政府必須重新思考新媒體的應用。他認為當下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因為現在處於資訊科技的發展初期，政府可把握此機遇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來應對日後由新媒體引起的輿論。

來自英國諾丁漢和伯明翰大學的Paul Collins認為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它要求公共管理者具備特殊的能力來應對來自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挑戰。包括債務和金融危機、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國際移民、難民、糧食和能源危機、種族或者宗教動亂、貧

困和腐敗問題，等等。國家能力已經在所謂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和適應力市場中得到削弱，因此在這個時候需要非凡的能力特別是促進公共機構中有效或者是有針對性的人力資源的發展。他認為解決之道在於一個提升表現能力的培訓政策方面的戰略方針。

此次研討會為與會專家學者提供了思想交流、碰撞的平臺，也彙聚了各地公共管理領域成功的案例和經驗，它不僅是一場盛大的“思想盛宴”，而且還是一次增進各地學者情誼的良機。各地專家學者在兩天的會議裏，共同探討公共管理領域的議題，既回顧了歷史上的公共管理實踐，又審視了當下公共管理的問題，又提出了將來公共管理的新議題。它的成功舉辦，有助於推動公共管理研究的發展，也能促進各地公共管理的改革。對於澳門來說，它的意義則在於提升了澳門的國際形象，更能夠為澳門的發展提供發展的思路，深化當前的公共行政改革，促進特區政府建立成一個透明、高效、廉潔的政府。

